

高陌正骨术和膏药的发展概略

姚德庆口述 县卫生局整理

位于易县古燕下都遗址内的高陌村以姚姓为主。姚家祖传的正骨技术和膏药秘方，由于技术精巧，疗效显著，理法方药独特，长期以来，不仅在本县负有众望，而且在附近各县及东、津、保等地也有盛誉，虽历经四、五百年，但至今兴盛不衰。

姚家祖传的正骨术和膏药秘方始于明末清初，盛于清末民初。据姚家历代相传，其第一代开业正骨医生为前十二代姚老匠。当时，姚家生活比较充裕，主人待人宽厚，一江湖侠客路过，因重病被姚家挽留，并精心护理，请医调治，病愈后，为报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正骨技术和膏药秘方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姚家。姚老匠得此秘方后，经过一段熟悉，就经营起膏药和正骨业，并开始世代沿袭相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清朝末年，姚家的正骨技术和膏药制作技术得到了较大发展，治疗效果也大大提高，因之，其声誉也为之大震。当时，来高陌求医的，经常大车小辆，络绎不绝，每天不下二、三十人。除附近乡老外，远者数百里。上至清朝王公贵族。光绪年间，清廷东台御史王其三股骨骨折，经高陌姚老客先生调治，很快痊愈，因此，给予重赏，并赠医一块。姚老客、姚老胜等人，都是当时高陌的知名正骨医师。民国初期，高陌正骨业由原来的一家开始分为姚兴三、姚老客、姚老宋三家。不久，又有一支到山西省落户行医，姚贵

轩医师目前仍在太原市医院从事正骨业。当时，姚家名医以姚花亭、姚树亭、姚翠轩为最。

姚家的正骨术，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传统治疗方法是夹板固定（主要以青麻杆为夹板），外敷膏药，内服加减复元活血汤。同时，还辅以牵引、推拿、按摩等多种手段。这种综合疗法，既治标，又治本。基本技术和秘方靠祖传，但功底决定于自己磨练。在过去没有检查器械的情况下，他们凭多年临床经验，在确诊、治疗技术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他们不仅能治下颌、肩胛、肘腕、髌、腰等关节脱臼，而且对四肢、肋骨、锁骨、腕骨等较复杂的骨折也有把握治好。其膏药经过不断提高，除治骨伤外，还兼治一切扭伤、挫伤及风湿疼痛等症。

姚家的正骨术，虽然效果灵验，但由于受封建社会的旧习俗影响，长期以来，只传于孙、儿媳，不传闺女。因而，其正骨术没有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姚家行医人员逐年增多，医疗技术和思想认识均有了新的提高。远在五十年代，其膏药已远销京、津、保及东三省。从业人员大规模增长，目前已达十九人（其中，在本村自己开业的十二人，在本县区、乡医院和卫生院的三人，在外县的一人，在外省的三人）。八十六岁的刘玉荣和八十一岁的姚德庆两位老人是当前该村个人开业的代表医生。在技术上的发展，主要表现

在不少从业人员，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祖传，而且通过自己的实践对祖传不断加以创造。姚德庆老先生在自己的实践中，把专治骨伤的膏药运用以筋伤、风湿疼痛等症，取得了较好疗效。多年来，为不少在大中城市医院久治不愈的患者解除了痛苦。一九七四年保定肉食业一位女职工，尾椎骨折复位后，很久不能走路，每月要花二十余元药费进行维持恢复治疗，姚德庆老先生改用座木推疗法，二十天便痊愈。房山县高乐一男性社员，左腿股骨完全性骨折，在当地求医治疗半年之久，病腿仍短一尺多，经姚老先生重新正骨，一不位院，二不做手术，一个月后就治好了，被当地人称为“活神仙”。一九七〇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位领导干部王××，肘关节骨折并脱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无效，后慕名来高阳求医，经姚忠医生精心治疗，一个多月胳膊便能自由屈伸。

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姚氏正骨医生的思想和职业道德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首先冲破了只传子、媳的封建禁锢，从六十年代起，就开始技术开放，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他们在本村办起了联合诊所，并设了位院床位，联合诊所内也吸收外姓人参加，本村朱秀俭、梁富的正骨求就是那时候本村姚氏医生教会的。多年来，高阳的姚氏正骨医生，通过办培训班、带徒弟等多种方法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正骨医生，他们不仅在技术上指导，而且献出了祖传膏药秘方。

姚氏正骨医生思想上的解放，还表现在于破除唯我独尊、关门行

医的束缚。积极学习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他们不仅购买和阅览了大量现代医学专著，而且决心走中西医结合之路，他们经常利用乡卫生院的X光机帮助确诊，并准备自己购置一台小型X光透视机。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加上他们的传统技术，一定会使我国医学宝库中的这颗明珠更为光辉灿烂。

附：姚德庆老先生口述的祖传膏药秘方：

芎归乳没红花桔	肉桂石斛半夏芍
苍术鹿茸广木香	羌解秦艽川大黄
二草丁香川牛膝	双子半两五加皮
石菖虎胫自然铜	川乌草乌台麝香
山甲鳖子干松香	油蜡煎成为灵膏
接骨续筋有奇效。	

原易县河北省立第八中学

易县政协

原易县河北省立第八中学的前身为清末易州州立中学。据史料载，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清廷命名府厅和直隶州均设中学堂。作为直隶州之一的易州，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正月，在易州城内办起了州立中学。这是易县的第一所中学校。该校招收的学生，以易、涞（今涞水县）、广（今涞源县）三县为主，同时也来自附近各县。因学校经费由易、涞、广三县筹集，故对本州学生的学费有所优待。凡易、涞、广三县前来上学的学生，每月缴大洋一元，凡外县的客籍学生，则每月缴大洋二元。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该校改为省立第八中学，由直隶省教育厅直辖。由于办学经费不再由本地筹措，学生学费才一律改为大洋一元。州立中学改为省立八中后，学生的招收范围进一步扩大。除附近的定兴、新城、徐水、满城、完县、曲阳等县外，远离易县的房山、涿县、京鹿、安平、新安、定县等县也时有学生前来投学，学生范围前后共涉及十五、六个县份。

开始，八中共设四个年级四个教学班，七名教师，学生百余人。至中期，发展到三个年级五个班，十二、三名教师，学生二百五十余人。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该校改为省立高等农业学校。校

址迁往县城四十公里处的梁格庄。该校最后发展到六个教学班，三百余名学生（都是男生），连同教职员工，全校近四百人。为了使學生增加专业实践知识，学校周围设有三个农事试验场：第一试验场在靖西陵行宫附近，以培育花卉为主，第二试验场在崇陵附近，以培植果树为主，第三试验场在公主陵附近，以种植棉花、蔬菜为主。学校还饲养有优良种猪、种马，为附近农民改良牲畜品种。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野心的日益明显，从一九三七年春开始，学校组织童子军，对学生进行军训。学生进入饭厅后，不许说话，没有号令不准吃饭，吃饭时间限定十五分钟。一切军训号令均由学校训育处掌管。不久，因“七·七”事变，学校只好于三七年夏季被迫停办。至今，原城内校址早已不见原样。搬迁后的高等农业学校校址今为西陵行宫招待所。

省立八中在其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历经三任校长。早期校长连穆如，易县人。清末秀才。后到北京上大学，曾游东洋（一说曾去比利时留学）。回国后来八中任职，最后又任易县教育局局长。中期校长姓卢，易县小坎下村人（今已划规满城县）。此人年轻，脾气暴躁。当时，学校规定不许学生吸烟。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学生偷偷抽烟，当场非让该学生把抽剩的半支烟吞下肚去不可。学生不肯，便被其关进屋子，限制自由。事发后，全班学生为该生求情要求释放，但卢仍不答应。他的行动，引起了全校学生的愤怒。学生们一气之下，把卢赶

出了学校。后来，省厅虽来人调查此事，但最后不了了之了。最后一任校长王国光，高阳人，天津师大毕业，当时五十多岁，国民党员。该校早期共有七名教师，有国文教师林奎腾，史地教师阎古芳，英文教师王毅卿，算学教师李丽廷，音乐、体操、手工、图画教师刘润轩，理化教师齐信斋，博物教师王燕农。连同行政管理人员连穆如和贾子芳等共计九人。

该校位于城内中央路北，校址旧属前清书院，面积三十余亩。规模虽不甚大，但经过学校主人的精心安排和不断修整，却井然有序。加上其谨严的管理，优良的教学成绩和对师生的精心挑选，作为全县唯一的一所最高学府是名符其实的。

在该校任教的教师，大多具有较高的专门知识和较强的事业心，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其中，不少人还有著述。国文教师林奎腾，闽侯人，据其学生记述，管“南出苗疆，北至蒙古”，又曾在黑龙江省援行教育司长职，在京师大学讲国文，民国五年秋来易县八中讲学（同时兼京师和易县两地之课）。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该人被称为当时闽侯三文学家之一，并被排在畏庐、涵芬两文峰之上。他博学多闻，不仅精通文学，而且熟悉政治、教育、实业，在以上各方面都有著述。其著作现已知道的，除《易水文集》外，还有《实验货币学》。此外，齐信斋和刘贡三两位教师的《诗稿》，在当地也有一定影响。

该校对于学生的挑选也是精益求精的。当时，该校的学生来源都

是各县高等小学的毕业生和同等程度者。因开始报考的人较少，招录来的学生虽是择优录取，但其程度仍有所差距。为缩小差距，便于教授，从民国元年始，数年坚持开办预备班（又名补习班）。学习二年后，经过严格考核再升入正科班。

学生入校后，校方采取一系列方法促其奋进，引其入门，提高其学业成绩。学校以“易”为训，制订校训八条，校歌十八章。其校训为：居易俟命，乐易养心，和易为治，慎易避难，率易处己，宽易接物，浅易说理，平易近人。这八条校训是全校师生的道德修养标准。从“易”字出发，一些教师还进一步发挥，称教师宿舍为“易堂”，称学生宿舍为“易斋”，称学校的水井为“易泉”，称学校之事为“易事”，就连师生们常去游览的西城门上的瞭望楼，也被称为“易楼”。这里“易”字的含义，据当时的学生张庆霖解释，“凡事谓之难即难，虽小而易者，必里中道而废，终不能有成，谓之易即易，虽大而艰者，亦必能率底于成也”。其意思是激励学生在学习中要奋力前进，不要畏惧困难。为引导学生尽快入门，在学业上尽快提高，学校采取按年级分别住宿，根据学生程度分别提出不同要求的措施，以写作教学为例。开始，对一年级学生多要求写各乡风土记，对二年级学生则要求写本县或本省的风土记，适当放宽视野；对三年级学生要求写宣言书、意见书之类，对四年级学生多要求写记体。对于同年级的学生，教师往往要报据学生所读的书，帮其确定具体写作题目。

对学生的作品，教师经过修改，由学校集印成册，名曰《易水文源》。这是该校学生的第一部文集。在此基础上，对学生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让一年级学生以“格致”为题，二年级学生以“诚正”为题，三年级以“修斋”为题，四年级以“治平”为题，进行写作练习，这些作品被命名为《易学进阶》，为该校学生第二部文集。当时，八中师生编辑出版了很多书，可惜多已散失，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易水文源》残本中的八十篇（共百余篇）和教师刘贡三、齐信斋的《诗稿》手抄本。从现存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八中学生的写作水平确实达到了一定水平。如，四年级学生高士俊（新城人）已能做书序，其师林奎腾的《易水文源》序，就是出自他之手。通过写作练习，学生的认识能力也得到了锻炼，不少学生在作品中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提出了好的设想和主张。就其写作水平和视野来讲，现在的中学生是有所不如的。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很多人考入了大学，并在各利政治势力中参加了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担负了领导工作和各种专业工作。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赵鹏飞同志就是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张师亮同学建国后就曾在兰州大学当教授。

八中的生存年代，正值我国的变乱时代。军阀混战，外国入侵，闹得民不聊生。鸡无宁日。这期间，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杂乱。少数人为维护旧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不遗余力。有的从忧国忧民走向革命，

也有些人昏昏然无动于衷。从表面看，八中师生埋头于教与学，静似无波湖水。其实，社会上的各种思想无不渗入校园内师生员工的头脑和心扉，并逐步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进步思想与维护封建传统的斗争，革命思想与反动思想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又有所侧重和不同。前半期，主要侧重于进步思想与各种封建传统势力间的斗争。在一些开明教师和进步学生中，随着他们对社会和国内外形势逐步的了解，忧国忧民的思想日趋明显。他们把自己对广大民众痛苦生活的同情和对外国入侵、军阀混战及各级官府中倒行逆施、不查民情等现象的痛恨，真实而完整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和文章中。如，刘贡三在其五古体诗《丐妇吟》中，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的痛不欲生的生活。唱起一家的惨痛经历使人目不忍睹。作者在最后还公然把导致这场灾难的原因指向了“政府人”。这首诗既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揭露，又是对当时政府的有力控诉。但是，当时八中校内仍存有大量的封建遗老遗少，而且得到社会上封建传统势力的强有力支持。一有机会，他们就校内外结会，制造事端。民国九年，校长连穆如建议易县政府，提取各村寺庙产业收入作为各村办学经费。谁知，这一建议引起了城乡旧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起劲鼓动八中学生闹事。在这些忠实的封建卫士们的鼓动下，八中学生又是罢课，又是上街游行，最后又结队到校长室，找校长闹事。在炊事员的帮助下，连穆如才从厨房越墙逃走。第一任

校长就这样被撵走了。

学校后期的斗争，主要是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而且主要活动体现在学生中。一九三二年，正当保二师学潮高涨之时，二师党支部积极向周围各县学校派遣力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该年春节后，利用各种关系，有六、七名外地学生经保二师介绍，转到了易县八中。其中，有被开除的保二师学生李焕昌和积极分子边义，有保定景仁中学的张瑞安，有保定育德中学的康汉文、王文泉，还有博野大同中学的刘春芳。他们，除张瑞安和边义二人是积极分子外，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直接受保二师党支部领导。其联系方法，有时保二师来人直接联系，有时寄送秘密信件。据张瑞安同志回忆，当时的信是用药水写成的，纸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用煮饭的米汤湿过之后，才能显示出灰色字迹。这些学生转到八中后，一面学习，一面暗中积极活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发展了三、四十个人，划分了四、五个小组。各小组每周集体活动一次，一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小组活动时，有时谈国内外形势，有时学习一些进步书刊，如《红军斗争小报》等。有时借学被的各种纪念活动搞些宣传。有一次，还邀请一位叫作金在天的朝鲜人给学生们讲了朝鲜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后人民的苦难生活。还有一次，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组织二十多人到县城北边的火车站道轨上集会。会上讲了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还喊了“十月革命万岁”等口号。去时，为了准备随时与警察搏斗，每

人手里拿着两、三块石头。校长王国光，是个忠实的国民党员，对学生们的这些活动非常敏感。平时，他除利用本校一些思想守旧的学生收集进步学生的言行外，还与公安局紧密联系，共同对付进步学生的革命行动。那次去火车站道轨举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虽是秘密行踪，但后来也被校方知道了。为这件事学校大动干戈。公安局派出了几十个警察，在校园内大搜大查，连教室和宿舍的地板都拆开搜查，凡是带红皮的书籍都被带走，还把城里一个姓魏的学生抓走了。不久，利用放假机会，学校又开除了二十多名学生。这次事件之后，保二师派往八中的学生，只剩下张瑞安和边义两个人，其余都校开除了。后来，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和校内的进步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工作，为党为国做出了贡献。其中，张瑞安同志，经过几十年的奔波现已离休。离休前是上海市房地产局副局长。